

書叢戰大界世次二第

法蘭西之悲劇

Tragedy IN FRANCE



法蘭西莫樂原著
ANDRÉ MAUROIS

第二世界大戰叢書之一

法蘭西之悲劇

法國莫樂著

上海復友興圖書印刷公司發行

No.515

前言

我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到美。在戰爭時期中我曾和英法軍隊相處，於六月十日因某種任務派往倫敦。我曾經在那些悲慘時日之中實地觀察法英的情狀；我對許多管理這兩個國家的政治家和指揮軍隊的將領們都很熟悉。所以，自然而然的，我的一班美國朋友都要以各項問題相詢。經過這些初度談話以後，我看出在很多問題上，即使是那些信仰堅強無庸置疑的人士，也都爲一些無稽謠言所動搖。事實真相對於我，看起來或者有點慘痛，我却深信牠對於我的祖國的危險性，遠遜於那些情感用事，牽強附會的敘述。我自然沒有見到一切事實，沒有知道一切事實，我不能執筆寫這一次戰爭的歷史，我也不想這樣寫，但是我能夠寫出我的親身經歷，我認爲這是我應該作的事。我因此盡我所能，客觀地，公正地，來描寫牠。

(一) 英法準備未週倉卒應戰原由

一九三五年歲暮某日，我在倫敦勒士理夫人家內，和她的令姪溫斯敦邱吉爾全用午膳。膳畢，他挽着我的手臂，和我走進一個小房間內。

「現在，莫樂先生，」他很坦直的說道，「你不應該再寫小說了，你也不應該再寫傳記了。」

我心中一驚，朝他呆望着。

「你現在所應該作的事，」他接着講下去，「就是每天寫一篇文章，每天寫一篇固定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之中，你要用各種不全方法，發揮一個固定的意見：你要告訴他們，法國的空軍本來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已經落到第四位第五位去了。你要告訴他們，德國雖然本來沒有空軍，現在他們加緊製造，要佔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地位了。你所要作的就是這些。你如果能夠通知法國這些真相，使法國聽從，那你對法國的貢獻，遠較你描摹兒女私情，英雄

慾念之舉要大得多。」

我回答他，我決非一個航空專家，我沒有資格談這個問題，而且，如果我講這些問題，也不會有人聽，所以，雖蒙他忠告，我仍要繼續寫我的小說和傳記。

「你這就錯了，」他聲調沉着，語帶譏刺說道。他講這話時，雖然發音微覺不易，却有一種特殊風味，聽來悅耳。「你這就錯了。在這個關頭，德國空軍的威脅，就是每個法國人所該注意的唯一問題。你們的國家或許就會因忽略此點，而致傾覆。莫樂先生，文化，文學，當然是極好的東西，但是，一個文化若無武力為後盾的話，那個文化就不能繼續生存了。」

話雖如此，我却從未寫他所勸我寫的文章，我現在很為懊悔。但是這番談話，給我的印象極深，常使我心中覺得不安。我也曾多次向當局探詢我國空軍的情形。然而每次所得到的答覆都不實在，都很悲觀。

「如果戰事一旦爆發，」一位指揮里昂轟炸機隊的上校告訴我道，「我自己和我的部下們都願為國盡忠，但是我們所能作的，也即此而已。」

「這是什麼原因？」我問他道。

「我們的空軍人數太少，我們的飛機式樣又太舊。」

到了一九三六年，情形更壞。工廠的怠工，政府的敷衍無能和官僚習氣竟把法國飛機製造量減到零的地步。說起來也許沒人相信，一九三七年法國每月產量跌到三十八架——全時德國的每月產量却在一千架以上。

那時法國，勞資兩方互相敵視，兩方關係極壞，而德國則徵發全國一切人力物力，準備着復仇戰爭。這種戰爭正是他們的政府當局一向料到，一向希望着實現的。當時法國正流傳着關於納粹政權各種弱點的無稽之談。實際上，這僅是法國人片面的幻想而已。那班深知德國內情的人——像英國大使斐利浦爵士和法國駐德大使龐賽等，幾年來曾經屢次發出警告來。我還記得他們兩人在一九三七年中，有過一次談話（我也在座）。

「你不要有什麼誤解，」龐賽說道。「德國現已強盛，她自己也知道如此而決意一逞了。現在英國和法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他們若不丟開一切，專心一志去擴軍，便祇有設法覓取德國的諒解了。」

我問道：「但是這點可能嗎？德國願意和我們諒解嗎？」

「德國，」龐賽恍似一個深刻幽默家，用諷刺語調回答道，「德國好像不要什麼而骨子

裏什麼都要——德國要發動，要變更現狀——現在她的領袖人物正歡喜各種莊嚴的慶祝，雄偉的標記。你要把他們收服過來嗎？那麼請你在萊茵河兩岸上造兩架巨梯罷。在一岸上排列着幾百萬德國青年，拿着卍字旗，在另外一岸上排列着幾百萬法國青年，手執法國國旗；然後命令這些青年們排好隊伍，在這兩架梯子上爬上爬下，另外在萊茵河中，停一艘船，請甘茂林將軍和希特勒坐在那裏評判。那麼法國和德國或許有成立諒解的機會，然而先決條件還是在你們全時要極爲強盛才行——如果你們對德關係，只倚重於她所輕視的外交辭令和繁文縟禮等，你們不去建造飛機戰車，而一味草擬牒文，發表演說，那我們終不免陷入戰爭之一途，而這次戰爭，我們決無倖勝之望。」

熟知德國新的武力，估計正確的人本不限於龐賽一人。各國把納粹的軍費與英法兩國的軍費互相比較，就深知歐洲的均勢已經動搖——所以很多國家就從事戒備。法國駐波蘭大使賴洛季就常對我說，他認爲波蘭在一九三六年後，竭力搏取德國歡心之舉，一班批評，殊欠公允。

「你希望他們怎樣呢？」他說道。「他們看見德國重整軍備，而英法却毫無對抗之跡，他們看見希特勒在一九三六三月進軍萊茵區（這是一個絕對違反羅卡諾公約之舉），而法國毫

無動作，未嘗一舉手以謀阻止，他們聽見法國總理廣播道：「我決不願聽令斯特拉斯堡在德國大砲射程之內」，但是繼此演講，他們却未見他有任何實際行動，他們對我們的信心因此一掃而空。波蘭的領袖人物遠在一九三四年就和我們說過：「如果你們不能阻止德國重整軍備，那我們就不得不與他爲伍了。」而全時，我們既失掉波蘭的信心，又眼睜睜的看着比利時和南斯拉夫和我們相離。

這樣的缺乏外交準備工作，這樣的委棄歐洲於德國霸權之下，英國本和法國負全等責任。英國國內有許多有勢力的團體，聯合一致，阻止英國採取高瞻遠矚，勇往直前的外交政策。英國的銀行界只關心於他們借給德國的錢，不脫幼稚見解，一心希望他們能和一個高呼志在自給自足的國家通商。還有一羣要人，對布爾希維克主義恐怖過甚，癡心相信國社主義就是阻止革命的陣線。全時一班有智識的自由主義分子，正在宣傳不惜任何代價以謀保全和平，和片面縮軍之舉，此種行爲，就注定了將來自由主義的死亡。以上種種，聯合爲一，確好墮入德國的掌中。

無疑的，英法的一般人士，意識上多少有些覺到我們的弱點的，所以在一九三八年竭力

反對戰爭。我們要明瞭這種情狀，看慕尼黑會議情景就知。美國的輿論，在這一點上對張伯倫和達拉第，批評甚嚴。但是美國並不明白實際情形。他們並未瞭解巴黎和倫敦居民的心理，這班居民但見他們沒有躲避空襲的掩蔽處所，沒有高射砲和防毒面具，再加上德國無孔不入的宣傳伎倆，那些震動人心的謠言，說只要兩噸炸彈就可以頃刻之間，毀滅整個城市，和使用毒氣，散在空中等等，早把一班人嚇壞了。

身居前線，親自作戰的人，也許會和一九一四年的人一樣勇敢抗戰，但是他們一想到後方的妻子兒女都要不免犧牲，就大大的胆怯了。因此慕尼黑和平，紐約雖認為恥辱，巴黎和倫敦的民衆却熱烈歡迎，令人不敢置信。他們把這一次外交上的退讓當作一個勝利而羣起慶祝。巴黎市參議會一位議員甚至提議把巴黎一條街名提作「九卅街」，來記念這個屈服的日期。

張伯倫先生是這些談判中的主角。這位做過伯明罕市長，許多會社的主席，實事求是，一向尊重條約神聖的人竟會和一個浪漫不羈的德國元首，除了對德國以外不負任何責任，除了對德國人民有利的協定才承認其價值的人，互相謀面，真是一件奇蹟。張伯倫原來就比任何其他英國人更具島民特性，所以在他初次和希特勒會晤以前，根本就沒有想到世界上會有

希特勒這麼一個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張伯倫與德國元首晤面後二月），他在法國外交部中向一些法國人士講他在貝許特斯加登所受到的款待。希特勒曾經問過他：

「我們是單獨談話？還是和你的隨員一同談話呢？」

「單獨談話罷，」張伯倫答道。

然後希特勒就領他到他的臥室內（他的譯員施密特博士同往）。這個房間很小，裏面有一張鐵床，牆上掛着一張極美麗的圖畫，這張圖畫來自慕尼黑博物院中，隨時更換。希特勒談話，滔滔不絕，令人無從作答，張伯倫爲之愕然。

「我到戈特斯堡和希特勒第二次會面時，」張伯倫說道：「我聽到他的談話仍是一味蠻強，我差不多即刻就感覺到像如此的談話，繼續下去，也是無益的。每隔幾分鐘（那也是預先安排好的計劃），就有一個官員走進來交給希特勒一件文書。希特勒看了，便滿面怒容，大叫道：「又有兩個德國人死於捷克人之手。這一切所流的血，都非報復不可！捷克一定要全部消滅！」我看他的怒氣一直增加（不論他是否假裝），我就向譯員表示還是終止談話，我回到旅館去爲佳。這個旅館在萊茵河對岸，所以我一定要擺渡過去。我退出的時候，希特

勒仍舊咆哮不已，送我到河邊上。忽然他停止說話，面容突然改變，望着我們脚下的河流，用一種柔和軟情的聲調說道：「啊，首相閣下，我很抱歉。我本想指給閣下看看這幕美景——但是現在已經被一層霧遮住了——」我真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轉變極快，一剎那中會從曠野匹夫轉成詩人意境的人。

一位和張伯倫同到德國的外交部隨員告訴我說，首相對於這些談話，極感隱痛，希特勒的一味咆哮，真是他一生所未曾經歷過的，所以即使是現在，如果有人在他面前講起希特勒的名字時，他就會露出像一個被逼着吃蓖麻油的小孩一樣的面孔。然而張伯倫總以為他的責任在於保全和平，他渴望他已達到目的。

他這種信仰，因他得到無數英法士女的頌德書札，而益堅強。我們法國千千萬萬的婦女，寫信給他，感謝他使法國免於戰禍，使他們的家免於轟炸，使他們的子女免於死亡。法國鄉間，有許多老婦，結了手套送給他，顫顫抖抖用很大的字寫在她們的信裏面道：「如此，首相坐在飛機裏面，可以不覺到手冷了。」諸如此類的表示，就使那位慈悲為懷的張伯倫夫人大受感動，她越加鼓勵她的丈夫採取緩靖政策了。

慕尼黑會議以後，這一條途徑，在美國就不得衆望。本來因爲陸軍和空軍都毫無準備，所以英國輿論界不得不勉強接受慕尼黑會議。但是她已經覺得這事太苦，而有損國家光榮。所以就立下決心，甯願犧牲一切，不再受這種屈辱了。一九三九年正月我赴英演講，足跡遍及英國各處。我發覺英國輿論已經走在政府之前了。那時政府仍狐疑未決，應否實施徵兵制，而整個英國却一致作此要求。我在英國各處，男男女女，不分階級，都和我說：

「我們一定不能讓這個希特勒統治歐洲，我們一定要有龐大強盛的陸空軍。」

我回到巴黎後，寫了一篇東西，我說英國要在三月實行徵兵；那時我的許多法國朋友都說我胡說，他們以爲英國一個最古的傳統即在反對強迫軍役，英國自然不會實行的。但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之中，英國終於實行徵兵制了。

德軍闖入捷京布拉格城，給張伯倫和他手下擁護綏靖政策的人，當頭一棒。這位英國首相大受震動。他本來就極端相信希特勒不會併吞非日爾曼族的。而現在呢，他正得到一個反證。他因此突然成爲希特勒的勁敵之一（這件事許多人都不知道）。就在這種悲憤交集的影響之下，他就出人意外地允許波蘭，保證她的安全。我那時正在美國，我就自言自語道：「這個意思就是戰爭了。」因爲，在一方面，德國要繼續擴展領土，攻擊波蘭，而在另一方面

面，英國一向對於她所正式簽訂的條約，矢忠不渝，這次當然仍是一樣了。

英國這樣突然回到歐洲政治合作之途，自然要和法國有更密切的諒解不可。一九三九年六月，英法同盟在巴黎舉行盛宴，英國陸相倍立夏，法國外交部長龐納，和甘茂林將軍都前往參加。倍立夏那時即席宣稱，戰事爆發，英國軍隊當即接受法軍統帥的命令，他覺得他能說一句「我們的甘茂林將軍」，極以為榮。這話說完後，歡呼四起，甘茂林將軍仍默然獨坐，不動聲色。宴畢倍立夏和我們同往波蘭大使館，那處正舉行盛大跳舞會，倍立夏參加目的，不過表示英國和波蘭更有一層新的聯絡而已。

這次盛會，我至今仍舊保持着一種慘痛的迴憶，那是一個美麗的夏夜，波蘭使館花園之中，白色大理石所雕刻的獅身人首像正在星光之下，閃耀發亮；那時樂隊正在演奏曉邦華爾滋名曲，紅光四射，如火如荼。在草地上許多穿著華服的美女（德國大使的兩位小姐亦在其中），正和波蘭法國軍官婆婆起舞。我們都認為戰事即在目前，波蘭即將為人所襲，那麼這一次的舞會，似乎與滑鐵盧之戰前夕威靈頓在勃魯塞爾所舉行的跳舞會相似罷。那晚與會貴賓觥籌交錯，一些部長們、大使們也都在閒談瑣事。他們講到巴斯德輪的處女航，更有幾位講他們到南美去的旅行計劃。

幾天以後，倍利夏又和邱吉爾同來巴黎，參加七月十四法國閱兵典禮。那天儀式莊嚴雄偉，是巴黎最後歡樂之日。法國陸軍從未有過如此雄壯軍容。凡是組成法國光榮的一切事物，都在這次檢閱中表現出來，計有輕騎兵隊，輕步兵隊，馬奇諾線防軍，海軍陸戰隊，及客籍軍等。邱吉爾笑道：「感謝上帝，法國有這樣好的陸軍。」我們那時那裏知道那種士氣、紀律和最優秀軍隊的傳統名譽，竟會因機械化裝備不足而不得一逞身手。當時觀者但見法國坦克軍隊魚貫而行，信心更增，但是他們不知道德國有更多的坦克車，牠們裝甲更厚，遠非我們的平射砲所可攻破。

那天午後，倍利夏和他的副官某大佐，同來見我，他講起他編練英國陸軍所遇着的各種困難。

「徵兵制，」他說，「自然是最好的，但是目前還祇是空談而非實際。既無裝備，又無訓練的軍官，所以我不能召集那些曾經登記過的人。」

「上次大戰中的軍官們呢？」我問道。

「他們不曉得如何使用新武器。」

「假使戰爭就在明天爆發的話，你能夠派幾師軍隊幫助我們呢？」

「立刻嗎？大概不會超過六師人罷。」

這麼一點人數，把我怔住了。但是幾個星期以後，我聽說法國參謀部向英國所要求的，在這次歐戰全期內只有三十二師，更使我恐懼了。我想起一九一八年時，美俄意日都是我們的同盟國，英國參戰人數有八十五師，而我們的獲勝還是間不容髮。所以我自然異常畏懼了。

那時龐納（他正作外交部長），也和我抱同樣見解。我曾經聽他講過下面一件事：

「開戰前幾天，即一九三九年八月杪，我請我們的陸空兩軍兩位主將到我的辦公室中晤談，我告訴他們戰爭就在目前，如果波蘭不屈服的話，短時期內，戰爭決不能避免。」我接着又說：「不過，如果你們說我們獲勝並無多大的把握，那我就勸告波蘭割讓但澤和波蘭走廊給德國。我知道這樣作的危險極大。大眾會攻擊我出賣了捷克之後，又出賣波蘭。但是我並不介意。任何辦法，只要免我國於滅亡之途，我都贊成，何況我國一亡，波蘭也是同樣要毀滅的。你們不要誤會，以為我還會懷疑德國作戰的意志。德國預備歐戰，前後已經七年，她如果不能用恫嚇政策，遂其獨霸之念，自然要發動戰爭。然而對於我們，展緩歐戰，極為有益。我們如果有一年半載的時日，從事擴張軍備，自有裨益。這就是我找你們諸位的

理由，我要問你們：「我們是不是軍事上有迫切的理由需要波蘭作此犧牲呢？」他們每人個別的回答我道，他們找不出延緩戰爭的軍事理由，他們以爲稽延時間，對德也是同樣有利。在如此情境之下，我也沒有別的措施了。」

然而他仍舊盡了最後的努力。八月三十一日午後一時，法駐意大使龐賽用電話通知他，意國外相齊亞諾願意召集會議處置波蘭問題及其他爭議。龐納外長相信齊亞諾的誠意，因爲：（一）意大利本來就未預備加入戰爭；（二）她和德國的盟約允許她有三年的猶豫時間；（三）意大利輿論一致痛惡戰爭；（四）齊亞諾和里本特洛甫的最近一次會晤，據說並不融洽；而且（五）意大利可以毋須戰爭，祇要在會議中，就可得到大部她所希望的利益。這種會議，於英法固爲有益，於意大利亦然。所以龐納決定贊助這個計劃。他後來告訴我，他謁見達拉第，通知此事，並且說：

「今晚六時內閣舉行會議；我將規勸他們接受這個提議。我請你贊助我。這樣，我們就能把既成事實，放在德國面前了。」

達拉第答應了。但是龐納把這位總經理的個性看錯了，他是一位誠正不苟的人，但是主見不穩，意志不強，時常爲後來游說者所乘。龐納那天整個午後都是如有所失，在勢他也應該

如此。因為那天傍晚內閣開會時，達拉第並未贊助他。內閣雖未斷然拒絕意大利的建議，却希望先看看德國和波蘭的直接談判，再定方針。所以當晚九時的官報祇輕描淡寫的說了兩句：「內閣一致贊成法國所接受的約束。」但是九月一日黎明，德軍便開入波蘭了。

第二天午後兩點一刻，龐納在外交部辦公室中聽到電話鈴響，拿起一聽，並無一句寒暄之辭，不覺一驚。

「我是齊亞諾，龐賽先生和羅蘭爵士都在此處。我相信召集會議，還不無可能……」
龐納因此答應齊亞諾，法國在第二天（卽星期日）午前，不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

我相信這一段離奇情節，至今仍無人講過。但是大家都知道法國依照龐納所許，到星期日正午才發去最後通牒，又到下午五時才宣戰。英國却相反，在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即宣戰。這種奇異措置理由如下：

一九三九年英國輿論，已與慕尼黑會議時純然相反，對於重新屈服，完全反對。國會議員，乘假期之便，與他們的選民們交談，見到全國人民的異常決心，大為感動。英國人民都深信戰事無法避免，所以甯願希望快一點戰反而更好一點。國會議員既如此為輿論所激動，就決意不再聽任張伯倫再表現他去夏的弱點了。所以，九月三日上午九時哈立法克斯勳爵打